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(第十六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金元名道士宋德方

魏宗禹
／著

宋德方是全真道兴起后金元之际著名道士，他超凡脱俗，专意修道，大力弘扬道教的业绩，精心组织编辑元代《道藏》的宏大工程，使道教走上了以文传道的新阶段。



25
:8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熔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董高怀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16辑)

金元名道士宋德方

魏宗禹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875 字数:300千字

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7-900362-49-5

G·20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李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维明	高 可
高专诚	陶正刚	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
谢 恺	董永刚	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
雷忠勤	霍润德			

目 录

- 一、金元之世道教兴 (1)
- 二、参悟生死入道门 (5)
- 三、随师万里雪岭行 (13)
- 四、重修《道藏》显名尸 (21)
- 五、三教圆融论心性 (29)
- 六、以文传道昊天观 (36)
- 七、乐全栖真永乐宫 (41)

一、金元之世道教兴

金元之世，道教兴盛，北方地域中，就有太一、真大、全真等三大教团风行，其中全真道影响逐渐扩大，元统一后，波及江南，明代依然传播流布。

宋德方(1183~1247)，字广道，号披云子，山东掖城人。是全真道兴起后金元之际著名道士，由于他对道教发展所作出的杰出业绩，大都在晋地展现，所以他虽非晋籍人士，不仅受到道教史学者所重，且历来也为晋人推崇。

全真道起于金而兴于元。从社会历史客观情况而言，金元之际，大河南北，沃土千里，却是战乱频繁，白骨遍野。《元史·释老传》言：“时国兵践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甚，民罹俘戮，无所逃命。”由于宋金蒙古军事集团，长期攻战，广大百姓颠沛流离，生活无着，生命危急。这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，迫使各阶层人们，寻求宗教中所给予的精神寄托与抚慰。“由来乱世宗教兴。”社会动荡，往往为宗教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。道教是产生于中土唯一有影响的宗教，与世界其他宗教比较，在起源与发展中有着自己的独特性。道教溯源，在东汉顺帝至灵帝(126~184)期间，由张陵、张角等先驱者，在古代巫术和秦汉时神仙方术基础上，创立五斗米道、太平道的早期宗教派别，由于奉老子为太上老君，确立老子“道”为基本教义，因而称为道教。道教的创立，非由某一教主单独之力，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而形成，先是

有符篆、丹鼎两派,在规制、组织方面奠定了其作为宗教应具备的基础。魏晋以来,进入道教勃发的第二期,直至隋唐几个世纪,道教内部逐渐分化,或向上层发展,或在民间传布,或构造道教神仙谱系,或梳理道教传承史,或充实教义,趋同三教合流,并涌现出众多名道士,促进道教在各阶层传布。至南宋偏安,与金元南北对峙形势下,战乱中道教内部宗派纷起,时北方王重阳在金大定七年(1167)创立全真道。金元之际且有刘德仁创立真大派,萧抱珍创立太一派,但历时不久,即湮没不彰。唯王重阳的全真道,革新教理,倡道与儒释三教结合,并在修炼方术方面重内丹,强调精、气、神的心性修炼,趋于方便易行,因此很快聚结众多信徒,特别是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,受元太祖成吉思汗推重,为全真道的发展,提供了极佳的条件。宋德方是丘处机的大弟子之一,为人干练,道法深通,亦见重于权势集团,因此成为全真道极盛时期的推动者,并成为全真道一代名道士。

兴起于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在元初达于鼎盛,这与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很有关系。首先,元王朝允许一切宗教共存,意在借助于各宗教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,营造一种人际和谐的关系,减少社会矛盾和民族间的冲突,以利于社会稳定。因此,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统治的时期,在其统辖的广大区域内,全真道与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等世界各大宗教,都得到了广阔的传播空间。蒙古族入主中原后,佛教具区域多样性,有汉地佛教、藏传佛教(俗称喇嘛教)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三大派系,各自传布;在唐代传入的景教即基督教,这时再度传入,蒙语音译“也里可温(Erkeun)教”,

又称十字教，在上层流传。伊斯兰教又称回教，流传也较为广泛。犹太教在开封、大都、西北和东南沿海都有流传，颇与回教混同，时人甚称犹太教堂为清真寺。不过十字教、犹太教等多在蒙古人、色目人群中流行。而在汉族聚居地域中，主要是汉地佛教、道教和儒家礼教盛行。全真道在此时能与儒、佛两家分庭抗礼，并驾齐驱，宋德方有功焉。综观历代之道门，多持独善其身、专务修道。而王重阳及其门徒丘长春等都有较高文才，特别倡导文与道并修共进。宋德方继承了这一优势，表现突出，他设局辑刊《玄都宝藏》，组织讲经，明显纠正了道教重修炼轻义理的偏向，推行以文传道，以义载道，使道教理论思维品位得到提升，因而一时道价尤重。

顺天 全真道在元代逐步成为道教的主流教派。元代的一切宗教教团，都受朝廷管辖，遵循所定的规范布道。在元初设置总制院，主管者秩从一品，后又将总制院改称宣政院，是元廷管理宗教事务和民族关系的衙门，其体制超出宗教信仰的事务。这一方面体现了元代的最高统治者，重视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；一方面对于各宗教的首领人物，以政府诏书形式，赐予各种名号，使宗教活动符合政教合一的体制，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元朝政权。再者，元代众宗教并存兼容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形态，既非佛教也非道教，更非其他的宗教。《元史·祭祀志》记载，以蒙古族为主导的元王朝，依然保持着传统萨满教信仰，同时在统一西藏过程中，接受了藏传佛教，将其宗教领袖由国师提升到帝师的地位，但他们的最崇高的信仰，却是祭天祀祖的宗法宗教。蒙古贵族入主中

原后,保留了原有崇奉天神、崇拜自然、崇敬祖先的信仰,又逐渐吸纳汉唐以来的祭神祀祖的宗法祭祀文化,从而将漠北与中土宗教祭祀文化融为一体,形成规范的宗教祭祀仪式,依时行祭天地神祇和宗庙大礼,形成一种宗法宗教的新制度。这一方面继承了蒙古族在漠北形成的宗教信仰,一方面又接续了华夏宗教文化的传统,这种宗教文化的交融,有利于缓解各兄弟民族间的矛盾与心理对立,形成多民族统一体的合作与团结,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。

全真道的名道士,均主张以《道德经》思想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教理,个体方面讲求独超,社会功能方面追求济世。王重阳、丘处机到宋德方三代师徒,原来本是儒业饱学之士。元廷的统治者重视全真道,首先是期望“长生”,其次则是从中识“汉法”,由是全真教得到发展机会。元廷也很重视佛教,厚爱“西僧”。但《元史·拜住传》又说,佛教“清净寂灭,自治可也”。认为欲安邦立国,只有儒学。元人对三教这样评说:“释如黄金,道如白璧,儒如五谷。”“黄金、白璧无亦何妨,五谷于世岂可一日缺哉”见《南村辍耕录:三教》说明元初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儒教的重要性。后世清代统治者也经历了同样的认识过程,认为治国安邦必须“以佛治心,以道治身,以儒治世”(《道藏辑要·雍正上谕》)。认为三教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,均有益于治国安天下。元延早在兵伐南宋时,“世祖初得江南,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,尤重进士。”《元史·儒学传》说“元兴百年,上自朝庭内外名宦之臣,下及山林布衣之士,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,彬彬焉众矣。”同时在燕京置宣圣庙,祭奠孔子,诏加号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

宣王”，从思想上促进了蒙汉民族文化的融合。同时，由于敬天祭祖礼制与政治的结合，使宗法宗教制臻于完善，并成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基础。值得重视的是元廷政治思想的形成，与全真道倡三教圆融联系在一起；成吉思汗重视三教的社会功能，与丘处机及其门徒宋德方的作用联系在一起，这就给全真道在金元时期宗教文化氛围中的兴起创造了条件，宋德方就是在这种以弘扬道教传统为本位，在实践三教合一中将全真道推向兴旺时期建功立业的。宋德方虽然其祖籍是山东东莱人，由于他的丰功伟业是在晋地太原、平阳（今临汾）展现的，其栖真之地又在晋地的芮城永乐宫，故自其辞世后，一直受到晋人的缅怀与纪念。

二、参悟生死入道门

宋德方之出生（1183）正值陆游所言的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之时，当时赵宋王朝已南迁临安 50 余载，长江以北有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国争战不息。公元 1206 年铁木真建国，称蒙古国，1271 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，1279 年南宋灭亡，元朝统一中国。由此可知，宋德方一生都生活在战乱年代，北方均处在一种持久战乱之中。

宋德方家族殷实，被誉为“士林右族”，且以积善见称，在莱州地域中是有影响的大户人家，并享有受到尊崇的社会地位。后人在为宋德方所立的碑记中，由于其出生与幼年有种种祥瑞和神秘的说法。如说在他出生之晚上，其家的门

户外面，烛火辉煌，火光彻照，如同白日，里人十分诧异。又说，宋德方少时，春天郊野行中，偶得一个硕大的仙桃，他母亲说这是一个仙桃。他吃了这个仙桃便具有一种成为神仙真人的品性，这些含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与宋德方联系在一起，深含着人们及其门徒对他的敬仰和推崇。

宋德方家境优越，重视对后代子孙教育，故他有条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。据《宋天师祠堂碑铭》记载，宋德方在开始说话时，便好读书，在幼稚之年，不似同龄人贪玩嬉戏，专注于博览各种书籍，再加他“颖悟强记”，聪明过人，“识者谓是夙性熏习故”，因此一直受到长者的赞赏与关爱。少年时代就已经对于经史子集典籍认真阅读，“儒道经书，如春秋、易、中庸、大学、庄、列等，尤所酷好。外虽诗书子史，亦罔不涉猎。”很显然，宋德方从小便对儒家、道家的典籍，进行了认真的习读，奠定了较好的传统思想文化基础。

宋德方勤奋读书，但不是读死书、死读书。他的聪明智慧表现在面对动乱社会，很快联系到古代典籍中关于历代的兴衰治乱的记载，从而思索如何拯救民生于战乱的问题。因此在他12岁时，就向母亲问及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问题。“年十二，问其母曰：人有死否？母曰：有。又问：何以得免，母曰：汝诣武宫（陈垣《道家金石略》第547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版中作“官”，笔者认为应作“宫”。）刘师父去。”此时，金廷所据北方的中原一带，烽火不息，白骨遍野，沃土荒芜，民不聊生。有关生死的大问题深深压在这个少年的心头，使他过早地思考探索，于是向刘师父请教，以寻求关于人生哲学的答案。

刘师父就是刘处玄。(1147~1203)。刘处玄，字通妙，一说字道妙，号长生、长生子，世称长生真人，东莱(治所在今山东掖县)人。刘处玄的家世，是东莱一带显族，其先祖世居武宫，好积善恤贫，为宗教寺观舍良田 80 余顷，以祈福愿。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，由于孝义事迹显著，受到朝廷旌表，蠲免租征，称声于郡里。在刘处玄时，家世虽衰，但遗风犹存，他敬事孀母，特以孝闻，誓不婚娶与做官，清静自守，超脱现实，显露出异于常人的风骨。金大定九年(1169)王重阳由终南山到此传道，秦志安《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》(载《甘水录》卷二)称王氏“爱其殷勤，美其专精，顾其神彩之不群，乃叹曰：松之月，竹之雪，故不受黄尘。”从此，刘处玄拜王重阳为师，为“北七真”之一。当宋德方询母不死之术时，刘长生正在武宫演教。同里人宋德方往武宫拜见，刘处玄同他言谈融洽，喜其言之有物，勇于追求人生意义，赏识其清秀气度，洒脱聪慧，便以道家正法启迪引导，循序教诲。从此宋德方便留待习道，不复归家了。

宋德方在刘处玄的教诲下，很有长进。由于刘处玄引导数载，悟性已高。一日，宋德方独自游览于蔬圃中，为一女子所挽，他便与之对话，言语之中，多为道人气度，女子觉他有些呆痴之味，但又显示了宋德方未脱凡俗的一面。这事被刘处玄得知，便告戒他说：“聊以此相似，慎勿以人言教之，真人(按指宋德方)益感悟。”(商挺撰《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》载《永乐宫碑录》)这段记载说明，宋德方“居数岁”在刘处玄身边，经过精心培养，并试之以法，仍发现宋德方在精神上距超凡脱俗有一定差池，尚需勤奋专修，继续不

断努力。虽如此,刘处玄对宋德方的修炼充满信心,于是便离他随王重阳四处云游。这时,宋德方还未成为道士,引导他成为道士者,乃是王处一。

王处一(1142~1217),宁海东牟(今山东牟平)人,王处一在28岁前,屡次与异人相逢,“遂与其母皆为老氏法”。(姚燧撰《王宗师道引碑》见《道家金石录》第469页)金大定八年(1168)时,全真道在山东各州郡传播,名声很大,于是王处一便与其母一同投拜王重阳为师,王重阳接纳并为其命名道号玉阳、玉阳子,并在昆嵛山加入一同修道行列。不久,王玉阳辞归查山修道。王重阳在金大定九年,带领丘处机、刘处玄、谭处端、马钰等四弟子,由文登前往宁海,看望王处一。在行进的途中,引发了一段奇闻逸事:是年的夏季,天气炎热,王重阳责门徒四人先行,自己慢行居后,约师徒相距半里,王重阳将手执之伞,掷向空中,此时丘处机偶然回首,但见一伞,扶摇直上,腾空而飞,竟飘落到百里而外查山云光洞王处一的修道处。伞上还刻有一个意为七人的符号。这些故事,为全真道的创始者王重阳及“北七真人”,都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此后,王处一没有离开过云光洞,一直制炼形魂,苦修道术,有“铁脚仙”之称。由于王处一没有随王重阳一道云游汴梁等地,王重阳去世之后,也没有扶柩护丧,说明他虽经王重阳点化,但其道术渊源,并非专注于王重阳,于王重阳之外,或另有其所宗,与王之关系,不及四子为密。

使宋德方成为道士的是王处一,由李鼎、商挺所撰的《披云真人祠堂碑》《崇文明化真人道行碑》中说:“后得度于

玉阳，占道士籍。长生仙去，事长春国师于栖霞”。“后事玉阳，始占道士籍。未几，遂事长春国师于栖。”（均载《道家金石略》第546页，613页）这两通碑文前者铭刻于元中统三年（1258），后者铭刻于元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。前者距宋德方仙逝约10年，后者距之约25年，正是全真道最为兴盛之时。碑文文字说明宋德方是在事奉王处一为师时，正式为道士的。不过，识者多述他是刘长生的大弟子。刘长生门下弟子甚多，大弟子有：

离峰老人于尊师

口真子李尊师

敕赐颐真大师莹然子周尊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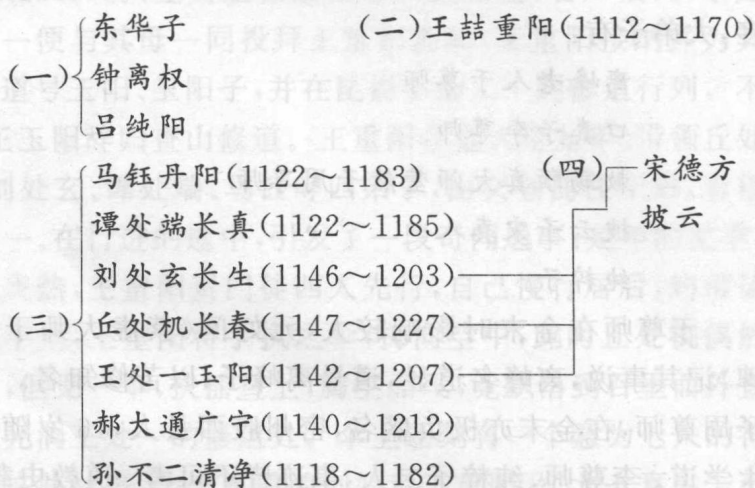
披云子宋真人

纯粹子

于尊师在金末时影响较大，元好问《紫虚大师于公墓碑》记其事说，离峰名道显，道号离峰子，以苦修知名。莹然子周尊师，在金末亦极负盛名，密州胶西县人，16岁随刘长生学道。李尊师、纯粹子二人，事迹皆不可考。道教史载，宋德方披云真人为刘长山门下掌教大弟子。宋德方的大弟子秦志安，撰有《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》说：“长生老仙，乘紫云而下游碧海之边，契重阳多劫之缘，披云宋君袭教，軫承法轮。”说明刘长生悟道于东海之滨，结缘于王重阳之师，宋德方是他的主要继承者，而秦志安又是披云真人的得意大弟子。

道教史往往将宋德方列在丘处机的门下，宋德方自己也这样承认。长生真人仙逝之后，宋德方便拜丘处机为师。

王重阳创立全真新道教后，共有七位大名鼎鼎的弟子，在道术上，七人虽各有别，但从亲疏而言，分为两种倾向，一种是嫡传弟子，一种虽有点化教化之恩、之传，但各自又有所本。这对宋德方在道教史中的位置及思想，都有重要影响。根据全真道典籍记载，史称全真七子，是全真道第二代传人。李道谦在《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》中，记载了全真道传授的源流系统，宋德方处于这样的位置：



李道谦的全真道源流系统，将东华子等列于全真道之源，其意义是在说明，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，依然是道教，是从原有道教中发展起来的。对此，从王重阳与全真七子，以及宋德方披云真人等，均予以明确的承认。其二，李道谦将东华子等，列为全真道的第一代，王重阳为第二代，全真七子为第三代，宋德方为四代，李道谦将自己列入第五代，这一排列，构成了全真道的道统系列。其三，宋德方披云真人，在全真七子中，有三人曾对其进行过渡化与教诲。对于全真

七子的基本情况,有两方面值得说明:一是全真七子中,丘、刘、谭、马四子,是王重阳的嫡传,而王玉阳、郝太古、孙不二虽亦与王重阳有点化之恩,他们亦拥戴王重阳为全真道的大宗师,但他们自有对教义的理解、悟道的一套方法,并非王重阳的嫡传弟子。如王重阳由山东往汴梁等地布道,丘处机等四子便相随前往,而王玉阳等各操自守,王玉阳自己便在查山云光洞洞居修炼。又如王玉阳、郝太古和孙不二等三子,都未参加王重阳的丧礼,郝太古曾想与丘、刘、谭、马四子一同为王重阳守丧,终因名分不同,遭到谭处端的公开拒绝,只好往赵、魏之间云游布道。还有,全真道在发展过程中,其主要教权,始终掌握在其嫡传弟子们的手中,在王重阳仙逝以后,丘、刘、马等,都曾执掌过全真道的全权。另一方面王重阳仙逝之后,马钰执掌教门,他仙逝后,刘长生、丘长春与王玉阳等先后执掌过教门。王玉阳因在金廷皇室中享有盛誉,也受到下层百姓的拥戴,山东全真道的基业,基本上是由王创立开拓的。全真道的弟子辈,在云游中亦可到他人门下习道。例如尹志平与宋德方在全真教中是一代人,也是莱州显族,其家高祖以下中进士者多人,《北游录》载,尹志平在5岁祭祀中,私念祖先悠悠不知所往,人之有死,亦自不知所归,心思久久惘然。从此,与宋德方一样,沿着寻求生死的原因与人生哲学之途,14岁便拜七真之一的马丹阳为师,并先后从马丹阳、刘长生、郝太古、丘长春等诸天师问道,以求全真道教义的真谛。后便追随于丘长春左右,在丘长春仙逝后,便执掌教门,并使终南山重阳宫成为全真道的一个传道中心。从中可见,全真道虽然内部宗派林立,也

存在着嫡传或门户之见，但多数门徒，云游四方，不仅造访各门派的掌门人问道，而且还向其他异人请教，这也是全真道一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由此说来，宋德方在成道立业过程中，是先期受刘长生、王玉阳的点化，后期又受到丘长春的指教，成为全真七子之后的一位备受崇敬的天师级人物。

宋德方一生分为三个时期，第一个时期是他在12岁以前的阶段。由于其家境较为优越，传统教育为其进一步求道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，正是由于他曾认真习读了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大量的典籍，才使他探索人生哲学问题具有着一执着的追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思想逐步深化。第二个时期，他加入全真道后，直到其启蒙大师刘长生仙逝之时，他在习研全真道真谛中，虽为刘长生门派的掌教大弟子，但他从未固守一家之言，一派之义。与宋德方同属全真道一辈的尹志平清和子在《北游录》中揭示说，马钰是“以无为主教”，刘长生则“无为有为相半”，丘长春则“有为十之九，无为虽有其一，尚存而勿用，道同时异也”，王玉阳则主张“齐修、聚神”等，这些主张的差异，真可谓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四子对其师的思想，各有所悟。宋德方综合其先辈主张，倾向于丘长春以“有为”之行，修炼心性。王利用于元延祐七年（1314）撰写的《披云真人道行碑》中，谈及了宋德方学道的历程，认为他在全真道的后半程，可以说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，为弘教立下了卓著的业绩。其中说：“抑所谓‘三灯传一灯，一灯续三灯’者，此也。由是行成于内，声达于朝。”（《道家金石略》第753页）王利用是元朝廷祐年间的四

川道按察使，既非释家，又非道家，他借用了佛家法之灯的喻义，又说明宋德方融合了王玉阳、刘长生和丘长春的道旨，以三家之说融于一，以一家之说续三师之旨。正因为他能兼容诸师的精义，所以弘扬了全真道义，誉满朝野，将全真道的发展推向了鼎盛阶段。

宋德方经过七真中三位大师指教成业，后追随丘长春左右，成为其重要助手，先是随丘处机西行万里，觐见了蒙古国首领成吉思汗，后又受其师丘长春的委命，组织和编辑了《道藏》重修工程，从此道教走上了以文传道的新阶段。重要的是宋德方的这些活动，都是在晋地开展的。他在整修《道藏》时期，可以说走遍了三晋大地，在太原的龙山，在芮城永乐宫，都留下了他的行迹，因而在全真道甚至在整个道教史上奠定了崇高的地位。

宋德方少年时代在探求生死这一人类永恒主题中，转向求索人生观的理论诉求，并从珍惜生命中，确立了捍卫人生的价值理念。这些思想深刻的蕴义，不仅为全真道教义开放性品格增添了积极的因素，也使他超越了一般道士狭隘的胸襟，走上了具有社会和政治性鲜明特征的后半生。

三、随师万里雪岭行

宋德方在刘长生、王玉阳仙逝后，拜丘处机长春为师。丘处机（1147～1227）字通密，道号长春子，出身于栖霞一个农户之家，自幼父母双亡，19岁时经马丹阳介绍，与